

●《“七五”以来我国经济效益研究》课题组

“七五”以来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研究

“七五”时期(1986~1990)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快、体制变动最为剧烈的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虽然目前我国已进入“八五”计划的第三年,但是“七五”时期对我国目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远的。为此,考察并研究“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变化及其成因,不仅是总结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经验教训的重要环节,而且对于制订当前及未来我国工业发展政策的启迪意义亦是无可替代的。

一、综述: 各界对“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有关认识和评价

(一) 各界对“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评价的综述

总体而言,各界人士对“七五”以来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研究结论和基本评价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其主要观点大致包括如下内容:

1. “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的总体经济效益仍处于低水平,甚至还出现了局部意义上的下降局面。有关这一点,实际上几乎已成为所有关心我国工业经济效益问题的人士的共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如周叔莲所述:“我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一段时间内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逆转。从许多资料看,1985年以来经济效益的一些重要指标不仅没有提高,而且还下降了。”另外,在理论界和政府有关权威人士所做的分析报告中,也都表达了相类似的观点。并且,在大多数人士看来,“七五”期间我国工业经济效益下降与工业的高速增长又构成了一个似乎高度相关的矛盾,以至于不少人士试图从中找出两者之间某种内在逻辑,甚至将速度与效益列为一个必须进行选择的原则性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可能是出于某种良好的愿望,也可能是因为经济效益问题已如此瞩目,以至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对评价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的研究如日中天,各种新的指标和体系构造层出不穷,可以说几乎已穷尽了各种可能。

2. “七五”时期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体经济效益之差,已成为最令当局者焦虑的一个问题。人们发现,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体经济效益似乎一直呈上下徘徊乃至滑坡趋势,相当多的国有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为此而一直处于发展困境之中,其中一部分甚至已面临破产的境地,以至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已成为我国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如此,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七五”期间工业经济效益状况最差的当属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则至少还不至于令人如此担忧。而且由于国有工业企业仍是“七五”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主体,因此其经济效益的滑坡事实上直接导致了整个工业总体经济效益评价指标的下滑。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国有工业经济效益不佳,自然不只是一个工业本身的问题,其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的生命力能否延续和扩展。

3. “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不佳的局面是在政府倾全力于提高工业经济效益之

背景下出现的,从而成为又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七五”计划提出,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正确处理好效益和速度、质量和数量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观察却表明,虽然“七五”计划所规定的增长率指标已基本乃至超额实现,并且“七五”期间政府为提高工业经济效益也作出了最大的努力,然而事与愿违,正如人们所已认识到的那样,“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并未如政府所期望的那般与工业增长保持同步或是相协调。由此只能得出两个疑问,即(1)政府工业经济效益的政策努力本身可能存在较大的缺陷,从而使这种努力事倍而功半;或者(2)在政府政策与企业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有效的传导机制,以至于政府的政策引导未能起到基本的作用。

(二) 各界对“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问题的若干质疑

1. 在占主流的意见中,其往往以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数据为主要依据。然而进一步考察表明:“七五”时期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逐年下降,1990年仅为54.6%,比1985年下降了10.26个百分点;“七五”时期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3%,比同期全部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低5.9个百分点;在“七五”时期我国工业总产值增加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的贡献度也仅为47.6%。上述数据表明:(1)尽管全民所有制工业仍是我国工业发展的主体,但是其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并不足以使其有关经济效益指标的变化完全或是基本能够代表“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具体变化;(2)必须承认,在对我国工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的各不同所有制工业中,全民所有制工业的影响力自然还是占首位的,但是,“七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工业在我国工业中的地位下降这一事实表明,其经济效益的变化并不必然能够决定全部工业经济效益的变化趋势,甚至也有可能在某些指标上与之出现相反的变动轨迹。由(1)(2)可以认为,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数据作为判断分析“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变化的主要依据,显然由于其涉及面有限以及其涉及面本身可能存在特殊性而多少缺乏足够说服力。

2. 纵观各界对“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问题的有关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可以说在此问题上绝大多数观点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试图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系列经济效益指标中,究竟何者才是其中的具有本质意义或代表性的唯一指标。但是,即使从统计意义上来说,选择一个最具关键性或是最有代表性的指标来概括工业经济效益及其变化的一般特征,不仅无多大现实意义,而且也无多大科学性。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企业而言,重要的不是指标,而是由这一系列指标所反映的经济活动的绩效,而不仅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而且即使是在不同企业之间,对于这种绩效的具体评价也往往存在较大的分歧。

二、工业经济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在已完成的对“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一系列研究中,有关经济效益评价的指标事实上几乎已被扩展到了极限。因此,对于本项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再对有关工业经济效益评价问题提出一个或是几个新的指标,或是重新归纳出一个具有关键说服力和代表性的指标,而是在总结和比较已有各类指标的基础上,从指标体系的更合理的构建入手,区分不同指标的不同应用价值和可信程度,选择其中若干不可或缺的指标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使之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并至少能有助于本项研究的指标体系。

(一) 工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本研究目的所在的指标体系的建立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

1. 普遍性原则。所谓普遍性原则是指凡是能够反映工业经济效益的指标都应在指标体系的选择范围之内。

2. 方面性原则。所谓方面性原则，是指在具体运用计量指标评价工业经济效益时，必须考虑各指标本身所重点反映或直接反映的经济状态的区别，而这种经济状态的区别又主要是由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及生产要素的具体构成所决定的。由此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充分反映这种区别，使指标体系兼具全面性和针对性。一个比较合理、完整的工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应当在社会生产活动的各环节和生产要素的各部分上都有指标反映，并且在指标体系的具体应用时，实际上构成整个评价过程的各个相应的方面。

3. 单一性原则。所谓单一性原则，既是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各个环节或方面的指标构成的单一性，也是指指标体系各方面的单一性和相对独立性，而并无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设计一个综合指标来从总体上概括反映工业经济效益状况。也就是说，按照这一原则所设计的指标体系，其在具体应用时，一般由某一项指标反映工业经济效益的某个方面，而多项这样的指标的组合作为反映整个工业经济效益水平的全部。

(二) 工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设计

根据上述原则，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我们所设计的工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构造如下：

1. 反映直接生产效益的指标：

(1) 反映直接生产过程中资金运用效益的指标：

$$\text{资金产值率} = \frac{\text{工业产值}}{\text{全部资金}} \times 100\%$$

(2) 反映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运用效益的指标：

$$\text{全员劳动生产率} = \frac{\text{工业产值}}{\text{劳动力总量}} \times 100\%$$

2. 反映生产和交换效益的指标：

(1) 反映生产和交换过程中资金运用效益的指标：

$$\text{资金利润率} = \frac{\text{利润总额}}{\text{全部资金}} \times 100\%$$

(2) 反映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劳动力运用效益的指标：

$$\text{人均实现利润} = \frac{\text{利润总额}}{\text{劳动力总量}} \times 100\%$$

3. 反映生产、交换和分配效益的指标：

(1) 反映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资金运用效益的指标：

$$\text{资金利税率} = \frac{\text{利税总额}}{\text{全部资金}} \times 100\%$$

(2) 反映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劳动力运用效益的指标：

$$\text{人均实现利税} = \frac{\text{利税总额}}{\text{劳动力总量}} \times 100\%$$

4. 反映整个工业社会生产过程效益的指标：

(1) 反映整个工业社会生产过程中资金运用效益的指标:

$$\text{每百元资金占用创造的工业国民收入} = \frac{\text{工业国民收入}}{\text{全部资金}} \times 100$$

(2) 反映整个工业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运用效益的指标:

$$\text{人均工业国民收入} = \frac{\text{工业国民收入}}{\text{工业劳动力总量}} \times 100$$

5、综合说明: (1) 上述各单项指标并不是唯一的, 其所列出的仅是相对更具代表性的指标而已; (2) 上述各大类指标的主要差别在于其考察对象的不同, 也可以认为这种差别导致了上述四大类指标的某种层次性。但是, 无论如何, 这种差别并不表明其中一类指标对工业经济效益的反映更具有代表性或根本性; (3) 如果要反映整个工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效益, 那么显然第四类指标 (即每百元资金占用创造的工业国民收入和人均工业国民收入) 相对更具宏观意义, 这是由其特定的考察对象所决定的, 而并不因此表明其能够完全或是基本反映工业经济效益的具体状况, 也并不具有根本意义; (4) 在具体考察时, 我们将第四类指标作为判断工业经济宏观效益和总体效益的基本指标, 而将其他类指标作为说明工业经济效益基本状况的结构性指标。虽然有这种分工, 但是必须再次强调的是, 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就象产品的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一样, 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使对工业经济效益的认识失去意义, 何况按照控制论的观点, 结构毕竟是决定系统功能的基本因素。

三、“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基本状况及其成因

(一) “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总体状况及一般原因分析

1. 基本判断之一: “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总体状况

从理论上来说, 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工业国民收入和平均每个工业劳动力所实现的工业国民收入两个指标, 相对更能显示工业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益。然而由于收集资料的困难, 因此我们只能选取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工业净产值来替代全部工业每百元资金所实现的工业国民收入, 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 “七五”时期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工业净产值

年 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a	2979.0	3488.0	4301.4	4903.4	5093.4
b	8149.4	9490.1	11148.6	13553.1	15953.4
(a/b) × 100	36.55	36.75	38.58	36.18	31.93

注: (1) a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工业产值, 单位为亿元;

(2) b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总额, 单位为亿元;

(3) a/b即为每百元资金所创造的工业净产值, 单位为元;

(4) 资料来源: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7)、(1989)、(1991)。

表2：“七五”时期我国工业人均创造的工业国民收入

年 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工业国民收入a(亿元)	3573	4262	5416	6241	6610
工业劳动力b(万人)	8980	9343	9661	9568	9697
a/b(元)	3978	4562	5606	6523	6817

注：（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

表1和表2的计算结果显示：

（1）“七五”期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所实现的工业净产值基本处于徘徊波动状态。在1988年以前，其有所提高，而之后则呈下降趋势，以至于1990年比1986年下降了12.6%。另据测算，“七五”前四年每百元资金所实现的工业净产值要高于整个“七五”期间同一指标的算术平均值。由于工业净产值指标基本能反映工业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因此可以认为：从创造新价值的角度来看，“七五”期间我国工业资金运用的总体经济效益处于上下徘徊波动状态，并且在“七五”前四年，虽有上下波动，但实际上仍能维持一定水平，而只是在1990年，其才发生较为明显的下降。

（2）“七五”期间，我国全部工业劳动力所人均实现的工业国民收入一直呈增长趋势，1990年比1986年增长了71.4%，年平均增长14.4%。其中，“七五”前四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7.9%，而1990年人均实现的工业国民收入则仅比1989年增长了4.5%。由于国民收入指标所反映的正是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新价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从创造新价值的角度来说，“七五”期间我国工业劳动力的劳动效益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提高，并且这种效益的提高一直是持续着的。

（3）综合表1和表2的分析，相对而言，“七五”时期我国工业劳动力投入的产出效益明显高于资金投入的产出效益。也就是说，从节约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七五”时期的工业经济效益，似乎更多地表现为工业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的节约。另外，一个相似的现象是，1989年似乎是整个“七五”时期工业经济效益变动的拐点，在此之前，工业经济效益至少远不如在此之后那般恶化。

2. 原因分析之一：“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总体状况变动的一般原因

（1）“七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深入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影响工业经济效益总体状况变动的重要原因。据统计，“七五”期间我国工业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2%，比同期国民收入年增长率高出2.6个百分点；工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由“六五”时期的45.46%上升至“七五”时期的46.14%。工业化发展的深入和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机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技术装备的进一步改善，而这又必然导致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工业增长过程中劳动力投入的相对节约；同时，由于工业投资特别是工业设备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张，使得单位产出的资金投入极有可能出现一定时期的增加。这也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发展的一般经验。

（2）“七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是造成工业经济效益总体状况上下波动乃至下滑的基本原因。一般而言，由资金投入的效益指标与经济增长的波动通常呈正相关关系。而在“七五”期间，除了正常的由增长波动影响下的效益波动因素之外，还由于我国当时特殊的国情，使得这种增长波动对效益变化的影响被相对放大了。观察表明，“七五”时期正好处

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六个周期,我国经济增长先后经历了三年的上升期和高涨期,两年的下降期和低速回升期。而且,由于“七五”时期是在“六五”后四年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条件下开始的,因此“六五”时期我国工业发展潜在的隐患在“七五”时期得到充分暴露,主要包括:①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发展滞后与加工工业迅速发展的矛盾日趋尖锐;②改革以来投资与消费的双膨胀,使国民收入超分配愈发严重,以至于1989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8%以上;③1985年底开始的两次紧缩措施,使其对工业经济效益的负作用集中在“七五”时期得到充分发挥。

(二) “七五”时期工业经济效益的结构及其原因分析

1. 基本判断之二:“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分布结构

由于统计资料收集的限制,我们未能将全部工业作为考察分析对象,所以在以下的计算和分析中,我们主要考察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状况。

(1) 直接生产效益。

表3:“七五”时期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产值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

年 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a	9434.4	11383.6	14588.9	17476.1	18692.6
b	8149.4	9490.1	11148.6	13553.1	15953.4
a/b	115.8%	119.9%	130.8%	128.9%	117.2%
c	6848.3	7096.6	7311.5	7421.0	7481.5
a/c	1.3776	1.6041	1.9953	2.3549	2.4985

注:①a为独立核算工业产值,单位为亿元;

②b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占用总额,单位为亿元;

③c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职工总额,单位为万人;

④a/b即为资金产值率,a/c则为全员劳动生产率(单位为万元/人);

⑤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7)、(1989)、(1991)。

表3显示:纯粹从直接生产角度来看,“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直接生产效益的变化实际上包括两个差异很大的部分,即一方面,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效益增加比较明显,而另一方面,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益则相对波动较大,甚至中后期还开始持续下降。

(2) 生产和交换效益。对于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和交换来说,衡量其投入产出效益的首要指标自然是利润水平。因为利润的取得不仅意味着产品通过交换实现了其价值,而且更由于通过交换取得了利润,才使其真正实现了所谓有效生产。

表4:“七五”时期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和人均实现利润

年 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a	877.6	1005.0	1189.9	1000.3	559.8
b	8149.4	9490.1	11148.6	13553.1	15953.4
a/b	10.8%	10.6%	10.7%	7.4%	3.5%
c	6848.3	7096.6	7311.5	7421.0	7481.5
a/c	1281.5	1416.2	1627.4	1347.9	748.2

注：①a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单位为亿元；
 ②b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占用总额，单位为亿元；
 ③c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劳动力总额，单位为万人；
 ④a/b即为资金利润率，a/c则为人均实现利润（单位为元）；
 ⑤资料来源：同上表。

表4显示：从生产和交换两个环节来看，自“七五”中后期开始，我国工业的要素投入产出效益呈普遍的明显下滑趋势；而在此之前，只是资金利润率有所下降，而工业企业人均实现利润则取得了一定的增长。

（3）生产、交换和分配效益。对于工业社会生产过程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环节来说，与前述不同的是，由于考虑了分配这一重要因素，因此衡量其要素投入产出效益的首要指标自然需要考虑社会产品分配这一问题，而需要由利税指标来反映。

表5：“七五”时期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和人均实现利税

年 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a	1665.1	1893.4	2288.8	2275.5	1945.9
b	8149.4	9094.1	11148.6	13553.1	15953.4
a/b	20.4%	19.9%	20.5%	16.8%	12.05%
c	6848.3	7096.6	7311.5	7421.0	7481.5
a/c	2431.4	2668.0	3130.4	3066.3	2600.9

注：①a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总额，单位为亿元；
 ②b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占用总额，单位为亿元；
 ③c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劳动力总额，单位为万人；
 ④a/b即为资金利税率，a/c则为人均实现利税（单位为元）；
 ⑤资料来源：同上表。

表5显示：从生产、交换和分配这三个环节来看，我国工业的要素投入效益持续全面滑坡的状况其实出现于1989、1990两年。而在此之前，劳动投入的产出效益是逐步提高的，而资金投入的产出效益却一直处于下降之中。

（4）小结

其一，从社会化大生产角度来说，“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生产各环节的大多数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在保持上升的少数指标中，其上升幅度也大多不甚显著。唯一的例外即是全员劳动生产率，它可以是“七五”时期我国工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中唯一保持较大幅度持续增长的指标。

其二，从各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益来说，“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效益似乎要相对优于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益，而这种优劣则又主要是由其各自的上升或是下降幅度的多寡来体现的。

其三，除了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之外，从1988年后至“七五”期末，我国工业各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发生了相对明显的下滑，并在根本上影响了整个“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变动的基本走向。

其四，比较而言，“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的直接生产效益似乎又相对优于融生产、交换和分配环节于一体之后所得以反映的经济效益指标。换句话说，正是引入了市场交换和收入

分配因素，由此所反映的主要工业经济效益指标值要劣于仅仅考虑生产因素时的相应指标值，然而前者毕竟更全面、更贴切地反映了工业经济效益的本来面目。

2. 原因分析之二：“七五”时期我国各大类工业经济效益指标波动的具体原因

(1) 制度变迁对“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毫无疑问，正在进行之中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其最终必将导致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显著改善。同时，由于改革又是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在改革期间，其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显得特别显著，其中“七五”时期制度变迁因素对工业经济效益的影响较典型的体现在：

其一，制度变迁是工业经济效益在不同环节上差别的重要原因，在改革以前我国绝大多数工业企业的生产通常是由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计划安排的，企业可以说是主要为计划而生产。因此其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便是尽可能地提高其直接生产效率，即提高资金产值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而在改革开始之后，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逐渐引入，使得大多数企业逐步转向为市场而生产，利润遂成为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更为重要的指标。然而，由于改革的渐进性，时至今日，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仍未摆脱政府行政附属物的地位，其名义上虽然是为市场而生产，但是一些重要的生产经营权还掌握在有关政府部门手中，因此这不能不导致企业追求效益行为的偏差和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削弱；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仍未真正适应为市场而生产这一客观要求。最终，反映在工业经济效益上，往往表现为直接生产效益似乎要相对优于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效益，即产值类指标要相对优于利润类指标。

其二，制度变迁直接导致了实现利税类效益指标的变化。显然，由于税收额的多少本身，即受到特定的税收制度的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利税类经济效益指标似乎更直接也更容易受到制度变迁的影响。虽然在“七五”期间我国工业税收制度发生了相应的改革，并且多种形式的上缴利税新方法（如包干）在全国各地也屡作试验乃至推广应用，但是鉴于财政对国民经济特殊的作用，因此整个“七五”间期我国各级税收征集工作实际上还是卓有成效的，其至少保证了国家和各级地区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而尽管其绝对量的增长率不甚令人满意。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在企业资金利润率和人均实现利润发生较大滑坡的前提下，“七五”时期我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和人均实现利税的波动要相对稳定得多。

(2) 技术进步对“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总体而言，技术进步对“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积极作用还是相当显著的，如“六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累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1072亿元，这些项目在“六五”后期和“七五”期间进入投产高峰期后，每年可实现2000多亿产值和400亿元的利税。但是对于相当一部分企业来说，由于技术进步工作薄弱，导致企业经济效益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主要体现在：第一，由于企业新产品开发普遍投资不足，以及企业技术开发资金来源的单一等原因，使得大多数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缺乏基本的财力保障；第二，相当一部分企业仍满足于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而对推动技术进步的积极性不高。如据有关部门对上海市200家工业企业的调整，1990年其旨在增加现有产品产量的投产比1989年增长了36.3%，而同期其用于新产品开发和工艺改进方面的投资却下降了12.7%；第三，大多数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推广工作薄弱，成效甚微。其集中表现于还尚未形成一种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机制，许多政策和管理上的问题还远没有完全解决；第四，科技与工业生产的协作体系还不健全，企业技术进步与社会科研发展的联系薄弱，甚至相互脱节。

(3) 产业结构变动对“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总体而言，由于产业结

构因素而对“七五”时期我国工业效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农业与工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在八十年代中前期，我国工业与农业之间曾经出现过相对协调发展的时期，然而自此之后，由于农业发展的相对缓慢，使得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再次趋于较为明显的失衡。“七五”期间农业发展滞后对工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主要包括：（1）农副产品严重供给不足，导致其零售价格水平持续上升，从而实际抑制了城市职工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为减少和补回个人损失，一方面要由政府提供价格补贴，另一方面大多数工业企业又在职工和市场的压力下不得不倾向于过度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水平。这样的必然结果，即无论是政府财政还是企业的经济负担都明显增加，而其最终又必然大多转嫁于企业之上。（2）那些作为工业原材料的农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不仅制约了有关工业的正常发展，而且也直接加剧了农产品特别是经济作物价格的上涨幅度。同时，由于“七五”期间国家减少或取消了对工业用有关农业原材料的价格补贴或计划供应，致使有关农产品的涨价部分大都进入了工业生产成本。另外还直接导致部分企业因缺少原料或是不堪成本负担而使开工率降低，大量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

其二，工业内部基础产业和加工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在八十年代以前，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和部分原材料产业即是我国经济的薄弱环节。经过八十年代的工业调整，虽然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基础产业发展的投资和扶持，但是由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消费品工业在结构和数量上的迅速扩张，导致基础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局面更趋严重。主要表现在（1）基础产业增长速度大大落后于加工业的增长速度，产品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加工业发展的需求，从而加剧了加工业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交通运输能力的缺口达三分之一左右。（2）基础产业和加工产业本身发展的低效益。即一方面，加工业发展中存在着各地区各部门重复建设、规模不经济、技术退化、劳动生产率低以及物耗比例过高等现象；另一方面，基础产业的建设实质上仍未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资源浪费严重，使得企业利润水平很低，甚至大量亏损，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资金也普遍不足，从而加剧了基础产业生产效率下降的势头。

（4）企业经营管理对“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薄弱，是“七五”期间我国工业经济效益上下波动乃至滑坡的重要内在原因。其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企业管理原则来看，忽视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行为短期化，其中企业行为的反经济核算倾向，在“七五”期间我国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中一度相当严重；第二，企业内部组织机构臃肿，既缺乏现代化的组织形式，又导致企业管理效率的低下和管理费用的过度膨胀；第三，企业管理手段落后，现代管理技术推广缓慢。如电子计算机在管理中的应用问题，至今进展甚缓，而且大多数企业只是在某些管理中加以初步运用，很少有企业建立了完备的电子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第四，企业经营管理科学化进程缓慢，包括企业重大生产经营决策普遍缺乏科学严密的论证分析，产品开发、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等重大项目的上马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在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还较多地存在凭经验行事的现象，科学管理的原则还远未在企业员工中普及；第五，企业基础管理薄弱。如缺乏严密细致的技术标准控制体系及手段，企业生产经营档案、情报等必备信息资料普遍残缺，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流渠道也大多不畅。

【附】：1991、1992两年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变动

表7：1991—1992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

	工业净产值率%	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元)	资金利税率%	产值利税率%	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润(元)
1991	26.77	13.02	11.88	10.11	3.12
1992	26.86	14.03	9.89	10.10	3.76

表8：1991—1992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

	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元)	资金利税率(%)	产值利税率(%)	资金利润率(%)
1991	12.3	11.8	11.6	2.9
1992	12.4	9.7	11.4	2.7

表7和表8显示,1991和1992两年我国工业经济效益在总体上仍保持了“七五”以来的基本态势,即我国工业经济效益不佳的局面并未发生扭转。从其原因来看,虽然1991和1992两年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观察表明,上文所述影响我国“七五”时期工业经济效益的因素实际上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有些甚至还愈加严重。如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在近年来的企业制度改革中,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以至于成为目前影响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普遍性问题。又如,近年来许多“三资”企业纷纷采取原材料、零配件等高价进口,产成品低价出口,以及其他扩大成本开支的策略来转移利润,逃避税收,这自然在帐面上造成了企业的亏损。就此而言,本项研究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在相当程度上似乎不止适用于“七五”时期。

四、进一步提高我国工业效益的政策建议

(一) 提高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基本原则

1. 以加速我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进程为目标。

提高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实质,即是要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有限资源,以此促进我国工业增长。以加速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为目标,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效益,最基本的必须做到以下两点:(1)加快工业的技术进步。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意义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都是以一定程度的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为前提的,离开了工业本身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技术基础,而只能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何况,对于象我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技术进步和创新更可以说是整个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生命线。(2)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和技术素质。虽然“七五”时期我国工业劳动者的整体文化和技术素质有了较明显的提高,但是相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而言,特别是在我国还有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亟待进入工业领域的条件下,提高劳动力素质就不仅是提高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条件。

2. 以协调我国宏观经济总供求关系为前提。

事实表明,宏观经济格局对“七五”时期我国工业经济效益变动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并且也是造成工业经济效益呈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今后宏观经济增长的波动不可避免,但是从减少宏观经济波动造成的经济效益损失而言,最大限度地降低宏观经济增长上

下波动的幅度，不仅可能，而且显然将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工业经济效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有利于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协调我国宏观经济供求关系的途径首先包括：

（1）形成合理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机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显然已不可能主要依赖行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并且行政手段也为历史证明其存在极大的局限。因此，如何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机制，当是提高我国工业经济效益所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2）有效控制工业投资的规模波动，合理引导近中期的工业投资结构，更为直接地看，有效控制工业投资规模波动，并适当调整工业投资结构，是实现工业经济效益稳定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一系列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中对提高工业经济效益也最具直接影响力。

3. 以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一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对提高工业经济效益起到制度保障作用。其主要表现在：（1）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实质上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更为合理的经济效益评价的客观依据，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只能是那些效益相对较好的企业；（2）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还将为企业合理选择和追求经济效益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使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和潜力能够在最大广度和限度中得到发挥。

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还能够直接促进工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主要表现在：（1）国有企业制度的重塑将直接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使其发展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促进其经济效益的提高；（2）企业破产制度与合理竞争制度的建立也将直接使企业真正感受到提高经济效益的压力，从而使其能够积极争取经济效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所提高。

（二）提高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基本思路

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虽然微观经济效益是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基础，但是由于两者毕竟存在着层次上的差别，因此宏观经济效益也并不是可以由微观经济效益所完全反映的；而且，宏观经济效益的演变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微观经济效益的变动。因此，提高我国工业经济效益，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充分发挥企业和政府的作用，在使企业（微观）经济效益普遍好转的同时，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宏观经济效益。

——提高我国工业微观经济效益的基本思路是：

1. 加快技术进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改进生产工艺装备，从节约资本和劳动以及改善产品性能等角度来进一步提高我国大多数工业的经济效益。

第一，加快现有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步伐。今后我国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的核心是需要进一步增大技术改造投资规模，为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创造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

第二，强化技术引进及其消化吸收工作。强化技术引进及其消化吸收工作，不仅是加速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而且同时也是增强我国工业发展的技术潜力的必由之路。

第三，依靠技术进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是现代工业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其主要技术特征表现在大型、高效和专用的生产设备和设备组合（即流水线）的大量运用。

2. 改善企业管理，通过管理手段和决策的科学化，改进管理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提高我国工业宏观经济效益的基本思路除了上述两条之外，还应包括：

1. 优化产业结构，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转换和各产业的协调发展，求得工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一，实现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从“七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实现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主要是指通过进一步加快基础产业的增长，使其与加工业的增长之间相互协调，做到供需基本平衡。

第二，加快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政府对于支柱产业的发展，应当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由政府资金和市场结构调整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同时，政府促进主导产业发展的首要目标，则应在于努力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为此，政府可采取投资倾斜、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以及必要的财税支持等措施。

3. 建立并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通过保持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尽可能减少宏观经济波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一，建立并完善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体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一以间接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实际上也是我国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仅决定着市场制度是否完善，而且也将对我国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完善并适当加强政府有关的反周期政策。反周期政策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政策。实践证明，科学、适当的反周期政策对于控制经济波动不仅行之有效，而且也是促进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 本课题系财政部“八五”科研规划的课题。

课题组顾问：杨公朴、金莲淑；

组 长：孙海鸣；

副 组 长：虞列贵、许洪标、王惠忠、徐渭平；

组 员：庄卫民、龚仰军、王蕾、吴亚军、贾鸣、史东辉、周文一、干春晖、
刘祥生、王向阳、朱文容；

执 笔 人：史东辉； 修改定稿：王惠忠。

简讯

海峡两岸税制税务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为增进海峡两岸对彼此税制税务的了解，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由上海财经大学台北市会计师公会主办的“海峡两岸税制税务研讨会”于9月27日至28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台湾方面代表有台北市会计师公会、高雄市会计师公会、台湾省会计师公会、台湾税制会、企业界、新闻记者等方面人士。出席会议的大陆方面代表有财政部税政司、国家税务总局税政司、中国税务学会、上海市税务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大学、企业界等方面人士。